

香港文學研究的

幾個問題

● 盧瑋鑾

一、前言

香港長久在英國殖民地政策的統治下，香港人習慣了沒有歷史感，也不預期前景，故對自身的許多問題，並不熱衷研究，就是有人在努力，也引不起大眾的注意。

自一九七九年以來，由於政治、經濟等因素，香港變得十分矚目，香港人忽然回頭來看看這個好處而又一直沒加注意的環境，中國人也驚覺要好好研究一下這個行將我屬的城市，於是，「香港熱」遂成爲潮流。文學，自然也同時排在受注視的行列中。

香港文學研究，由冷寂到今天的熱鬧，變化實在很大。眼看研究者從孤軍作戰到聯羣結隊成了龐大陣容，不禁叫熱愛香港文學的人百般滋味。我總算是個較早就在這個課題裏探索的人，現試爲近十年的香港文學研究情況作一簡要報告，並說說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幾個香港文學問題的討論

(1) 香港有沒有文學

香港人本身不大討論這個論題，研究者多持肯定態度，偶然有些悲觀說法，也只把沒有好作品，歸咎於社會對文學的不夠重視。①香港以外的人，持「香港沒有文學」論點的，在一九八三年以前較多，他們一般以較狹隘的文藝觀來評斷文學作品，又或根本沒有廣泛和深察香港實際情況，就下了斷語。例如一九七八年，台灣尉天聰在《殖民地的中國人該寫些甚麼？》一文中，②雖然沒有直指「香港沒有文學」，但全文精神還是指摘香港人沒有「用血淚寫下被侮辱的香港」。大陸方面，在一九八三年政策漸趨明朗後，「香港沒有文學」的說法已漸低沉，但一九八五年，馮牧在接受訪問時，仍說出下面一段話：

「……嚴格講，認真講，香港還沒有形成

自己的文學。……要使香港文學繁榮起來，首先要建立一個真正的香港文學。……都寫吃喝玩樂、消閒的，那怎麼行？……

③

直到最近，隨著政治經濟認同香港的必要情況，和中國的香港文學研究者隊伍在各大院校茁壯起來，「香港沒有文學」的聲音就銷滅了。

(2) 甚麼是香港文學

這個題目，一度成爲本地研究者和作家關心的、而又爭論最多的熱門論題。

早在一九八一年初，黃維樑已在報上討論《香港作家的定義》。④以後，有關甚麼是香港文學的討論斷斷續續都有人在報刊上發表不同意見。一九八三年二月至七月《當代文藝》上的文章，就是一例。到一九八五年五月前後，可說是討論的高潮，報刊專欄和特稿的文章衆多，甚至有點筆戰意味。但直到今天，這爭

論仍沒有定一尊的結論。許多學者也不再糾纏在爭定義的問題裏，而冷靜地從研究作品、作家、理論探索方面下功夫，例如對侶倫、劉以鬯、梁秉鈞（也斯）、西西、舒巷城、吳熙斌等作家作品研究，已慢慢上了軌道。理論方面，黃維樑的《香港文學初探》、⑤羅貴祥的《香港文學若干問題》，⑥都是值得注意的。而陳德錦的《台灣（文訊）月刊〈香港文學特輯〉讀後》，⑦雖說是「讀後」，但也反映了一定的理論根據。

(3) 香港文學的出路

肯定了香港有文學之後，跟著要考慮的課題，必然是「出路問題」。這個歷來身世曖昧的城市，主要應用的語文是中文，但生活形態與意識形態又與中國有著極大差別，反映人們心態與生活、感情的文學，應該是怎樣的一種文學呢？它與中國的關係如何呢？這種都市文學應朝那一條路發展呢？都成為研究者關心者的考慮重點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學文社主辦了一個公開文學講座，主題是「香港文壇的展望」，既回顧了七十年代的文學情況，也由吳呂南、吳萱人、司馬長風、張灼祥、周兆祥，及十一位來自不同文學組織、刊物的負責人，廣泛談及校園外文學、中文文學獎、出版事業、文學與傳媒關係、如何推廣文學等問題。可惜內容比較瑣碎，但畢竟是第一個較大規模的講座。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中文大學文社主辦「向態文學生活營」，營中舉行了「從香港的文藝雜誌看香港文學的出路」座談會，出席的有各文藝刊物負責人張慧貞、潘玉瓊、陳慶源、張嘉龍等。由於各人談與自己有關的雜誌

出路較多，對香港文學出路問題就忽略了。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一日，《新晚報》召開了「香港文學的出路座談會」，出席的有中國作家陳殘雲、秦牧、黃慶雲等，香港方面出席的有梁濃剛、李怡、舒巷城、曾澍基、黃繼持等。座談結論，中國作家說了十分樂觀而鼓勵的客套話，而本地人却顯得相當悲觀，這正反映了「隔」與「不隔」的認知態度。最值得注意的，倒是主持人羅孚在最後發言中所說的一段話：

「儘管香港文學有很大的特點，但必定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也許有人批評我的政治觀念太強，但我想始終會是這樣，……談香港文學的出路，不應該看得那麼狹窄，也不需要那麼悲觀。……」⑧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中文大學文社主辦「九七的啓示——中國、香港文學的出路」座談會，邀請了璧華、張初（金依）、黃維樑出席發表意見。由於涉及九七問題，談話中就提到言論、寫作自由的重要性，也提及「香港文學應改變現狀，……反映歷史，面對中國，則要寫出對大陸的感受，讓中國參考。」⑨

從一系列的座談會，及事後許多反應文字看來，談出路，的確很熱烈，但始終有點空論，悲觀的成分極重，也談不出一條可行的出路來。我們既不能像徐速提議的：「必須交由政府來作統一研究、檢討，配合各有關行業，才能謀求解決辦法。」⑩就只好如古蒼梧說：「在我們眼前的一切，依然是朦朧的。我們期待著濃霧的消散。」⑪

三、香港文學研究的回顧

最早對香港文學作較全面回顧研究的，相信應推一九七五年七月，香港大學文社主辦的

「香港文學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吳呂南等人組成籌委會，編印了《香港文學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資料彙編》。該冊彙編所收材料相當豐富，包括了一些原始資料，故其中雖有錯誤，但畢竟作了一次艱難起步。該學習班請了黃俊東、羅卡、蔡炎培、許定銘、吳萱人、也斯、胡菊人等主講不同分期的香港文學情況，只是聽講人數不多，影響反不如那資料彙編那麼久遠。

說到掀起香港文學回顧的高潮，應算是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四日，由《新晚報》主辦的「香港文學三十年座談會」。那一次參加人數很多，包括重要文學雜誌的負責人，最突出的是不同文藝觀點的人能聚首一堂，例如黃思聰、徐速的出席發言，打破了左右翼文化人多年不公開交流的局面。會中除各出席者就有關刊物作回顧外，也有書面發言稿。三十年來香港重要的文學雜誌都或多或少被提及。這次座談，學術成分容或不足，但論到資料提供，及把香港文學放到討論重點上，則功不可沒。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至十五日，由香港市政局圖書館主辦的《中文文學週》，以「香港文學」為主題，展開一系列演講會，講題包括研究方法、早期新文學發展、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學活動、武俠與科幻小說、小說與西方現代文學關係、新詩、劇作等。主講者包括了黃維樑、盧璋鑾、劉以鬯、倪匡、梁秉鈞、黃國彬、馮祿德。這是由政府首次推動的香港文學研究活動，也是由泛泛而論的座談會形式，轉到較具學術意味的會議方式的一個起點。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三日，由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等合辦的《香港文學講座》，講者黃康顯、黃繼持、李韋玲、盧璋鑾分別就史料、旅港中國作家的香港背景小說、香港性散文、青年作家前路等問題發表

意見。這與一九八五年九月七日的〈戰前香港幾個文藝期刊〉講座，連成一組的活動，都爲了向大眾推廣香港文學的認知。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香港文學研討會〉，參加會議的有來自中國、台灣、美國及香港的研究者，提交的論文內容包括史料研究、作家、作品、理論等，研究面廣，學術性濃。三天會程，提交論文的有：馬博良、黃國彬、林年同、王靖獻（楊牧）、黃康顯、容世誠、王仁芸、黃維樑、陳張美美、梁秉鈞、劉以鬯、許翼心、盧璋鑾等。評論員的認真與嚴謹，及爭論的尖銳，留給與會者極深刻印象。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浸會學院主辦，浸會文社及香港青年作者協會協辦的〈九七與香港文學〉講座，講者王仁芸、璧華、何良懋分別探討了七十年代以來的香港文學及大陸文藝政策問題，是一個較小型的座談會。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由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的〈四十年代港穗文學活動〉研討會，雖然題目名爲「港穗」，論文却仍以香港爲重心，出席的有華嘉、陳頌聲、趙令揚、蘇光文、鷗外鷗、盧璋鑾、黃繼持、文天行，提交書面報告的有黃維樑、冼玉儀。可惜部分論文內容取材角度頗偏向左翼活動與作品，無法反映四十年代香港文學的全貌。

至於刊物以香港文學回顧作專輯，且比較全面的有：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時代青年〉一〇〇期的〈十年來的香港文壇〉；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奮鬥月刊〉創刊號的〈香港近十年寫實主義文藝思潮之回顧〉；一九八一年〈學苑〉九、十期合刊的〈香港文學專輯〉；一九八二年二月〈新火〉四期的〈香港文學專探〉；一九八三年九月〈文藝季刊

〉七期的〈筆談會——香港文藝期刊在文壇扮演的角色〉；一九八六年一月五日〈香港文學〉十三期的〈香港文學叢談——香港文學的過去與現在〉。而以香港作家爲專輯的，一九七九年五月創刊的〈香港文學〉、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創刊的〈香港文學〉、〈羅盤〉、〈香港文藝〉、〈新穗〉、〈詩風〉等文藝刊物，及香港大學的〈學苑〉、中文大學中文系系會的〈學文〉，都分別下了苦功。

至於香港以外，中國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及一九八三年十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分別召開三屆「全國台灣文學學術會議」，但其中以台灣文學佔分量較重。一九八四年七、八月，廣東作家協會與暨南大學中文系合辦〈台灣香港文學講習班〉。台灣〈文訊〉二十期（一九八五年十月）刊出了〈香港文學特輯〉，規模很大，表現了台灣文化界對香港文學的開始關注，但同時也反映了許多因「隔」而產生的錯誤說法。

四、香港文學一些概念的釐清

歷年來，由於文學資料沒有作系統整理，有些研究香港文學的人，往往單憑個人經歷、記憶和已成定格的某些概念作爲理論根據，另一些研究者又會以此爲據，再加以發揮，結果形成「傳訛」的連鎖毛病，現試舉三個例子說明一下。

(1) 美元（援）文化

這個詞，對研究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的人，一點不會陌生，並且必然引用。據資料顯示，最早在報上提到這個名詞的，是政論家尙方。他在〈香港時報〉專欄中，文章題爲〈說美元

與美援文化〉，①引述「朋友」之言，對此詞下了定義：

「所謂『美元文化』是指美國朋友直接發行的刊物，……紙張印刷精美，售價之低廉，等於贈送。……所謂『美援文化』，是指一些得到美金援助的出版物。」

而其結論是：

「『美元』與『美援』文化的效用，第一是對一切私營的自由文化事業予以莫大打擊，使它無法抬頭超生，其次是廉價供給中共以大量的造紙原料。這不是利鮮見而害已多嗎？」

這種公然與美國過不去的說法，竟出自一九五六年的台灣派系報紙專欄中，相信許多日後引用此詞的人都會覺得出乎意外。事隔九年，政治立場右傾的〈文藝季〉，刊出巫非士寫的〈十年來的海外文藝〉，②「檢討了『美元文化』的功過：

「在好的方面，它啓發了今日文藝發展的契機；在壞的方面，它扼殺了自由局面的擴展。」

他認爲一九六〇年是「美元文化崩潰，獨立思想抬頭」的分水嶺。即一九六〇年，所謂「美元文化」已告中止。但後來的研究者，對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葉以前的香港文學，都一律籠統用上此詞。又由於它含濃厚的「政治背景」，往往把它與「反共文學」等同，成了貶詞。日後，研究香港文學的人，必須弄清楚「美元文化」的實質影響，也必須看畢所有受過「美援」的刊物，如〈人人文學〉、〈中國學生周報〉，及〈大學生活〉等所刊的作品內容，才可對五十年代香港文學做結論。

(2) 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關係

歷來提及五十年代中葉前後的香港文學，最普遍的說法就是香港深受台灣現代派的影響，但早在一九八〇年劉以鬯已提出不同意見，直到一九八四年他正式為文，認為「互有影響」^⑭。究竟實際情況如何，劉文中引過一些例子，但如要全面，則必須比較兩地同時出版的重要文藝刊物，才可得出有力而持平之論。

(3) 香港文學本土化

這個概念，早在「甚麼是香港文學」討論中，有人提出過。一般研究者往往把「本土化」的始現，定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之間，甚麼人推動「本土化」，也成了爭論的重點。例如君平《香港文學本土化運動》^⑮及馮偉才《評〈香港文學本土化運動〉》^⑯兩文，較具爭論的代表性，但對「本土化」這一概念，仍未夠深入探討，且六十年代中葉以前，有沒有「本土化」作品？也值得考慮。四十年代末期許多社會寫實作品，都足稱作「本土化」，研究者對他們又如何定位？

在未寫香港文學史之前，最好能先把這些未夠清楚的概念弄清楚。有爭論不要緊，最可怕的是不問根由地隨意濫用、亂用名詞。

五、香港文學研究的方法及態度

(1) 資料蒐尋及整理的重要性

在香港文學研究還在起步的時候，由於資料缺乏，有些研究者可能為求速成，不加考察，採用了二三手資料，甚至再加個人「大膽假設」，寫成了具有廣泛流傳的文字。也有些很熱心，但欠缺學術訓練的人，隨便採掘，東拉

西扯便成資料冊，這些東西一旦傳播，要更正就不容易，對香港文學研究，極為不利。

最早注意史料蒐集的應是一九七五年七月的香港大學文社。該年他們主辦了一個「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為了使學員有資料可憑，負責人以極少人力以極短時間，完成《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資料彙編》一大冊（以下簡稱《彙編》），包括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資料，有專訪，也有該時期的雜誌報刊作品輯影。整體來說，是直到目前，最豐富的資料冊。但由於編輯者沒有受過嚴格資料整理訓練，且對各時期背景、作家作品，缺乏了解，取材就不免流於粗疏。專訪時可能筆錄錯誤，又未經受訪者過目更正，又或因部分受訪者個人見解有偏面不全之處，而欠缺均衡補充，於是錯漏失誤的地方很多。正如我所說，《彙編》是目前最「豐富」的，故成為許多人取材的目標。我對編者的熱誠及工作，是敬佩的，但該冊帶來的後遺症——部分應由採用者的粗心大意負責，則感到遺憾。

一九八〇年六月，中文大學文社主辦「向態文學生活營」，也印製了資料冊。該冊內容有《香港文學史簡介》、《文學雜誌年表簡編》、《理論、背景及雜誌選材》等。至於其中的《香港文學史簡介》，是配合幻燈片內容，撮要地介紹了一九三九年至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發展情況。文中帶著相當濃厚主觀成分，且部分理論用詞過於傾向政治性，引用的資料部分也有錯誤。

一九八一年第九屆青年文學獎的負責人，為了與中山大學交流台灣文化，編成《中山大學交流團資料冊》，就是後遺症的典型病例。此冊子的粗疏錯漏，可見編者完全缺乏誠意，毫不認真的態度，令短短十八頁有關香港文學的簡介，錯誤百出^⑰。很清楚看得出，此冊是

根據《彙編》及《向態文學生活營資料冊》，隨意撮寫。由於它是在大陸剛開始注意香港文學研究的時期傳入內地，成了許多研究者的主要參考資料，真是後患無窮。

近年來，大陸關注香港文學的情況日趨熱烈，例如一九八四年廣東省作家協會、《當代文壇報》，及暨南大學中文系在深圳合辦的「台灣香港文學講習班」，就有來自全國二十多個省市院校的教師參加。各地學者寫成的論文數目日多，在一些院校裏，香港文學也算是受到注意的課題。在這種熱切研究狀態下，第一手資料却極缺乏，論文內容就難免良莠不齊。巴桐的《四十年香港文學活動一瞥》正是錯誤百出的典型例子。^⑱文中出現了一司馬長風是著名武俠小說家」等不可饒恕的錯誤，又最近創刊的《香港文學報》發表由香港記者執筆的《香港文壇現狀管窺》，內容也有錯誤，而該等文字却在大陸流傳著。^⑲

早在一九八三年，筆者已呼籲整理香港文學資料^⑳，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林真《趕快動手！——談香港文學史料的缺失》也作同樣呼籲^㉑。近年來，真正著急香港文學資料收藏，而又較具遠見及規模的，只有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及孔安道紀念圖書館。其中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館長楊國雄，在極度困難中不斷搶救珍貴文獻書刊，^㉒該館及馮平山圖書館已成為今天香港藏有香港文學資料最豐富的地方。而楊國雄、黃康顯也著手整理早期的文藝期刊。^㉓一九八六年九月成立的「香港文學研究會」，一九八七年成立的中文大學「香港研究中心」的「香港文學研究室」，都在做著資料蒐集整理工作。可惜人力與時間均有限，整理進展並不理想。

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黎活仁也於一九八四年六月獨力自費出版了《五四文學研究情報》

，每期收錄了香港幾個主要的文學周刊目錄，可惜，出版五期便停刊了。

吳萱人在整理香港文社史料，但仍未見公之於世。

至於香港文學理論方面：劉以鬯、也斯、黃維樑、羅童、葉彤、王仁芸、馮偉才、洛楓、梅子、東瑞、羅隼等都提出不同方向的見解，但仍未見成立系統的論著，大家都在探索階段中。

我用了十年時間，已整理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〇年間，約三百位中國文化人的資料，另有《立報·言林》、《星島日報·星座》及《大公報·文藝》等目錄、索引。這些原始資料的整理，可為將來香港文學史的編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幫助釐清了許多錯誤觀念。

香港文學史料一天不較全面公開及整理，香港文學研究就極易犯以訛傳訛的毛病，距離事實真相愈遠。因此，整理原始資料，是急不容緩的步驟。

(2) 文學作品選本問題

一般讀者通過文學作品選本，了解一個時代一個地區的文學面貌，本是最通常的途徑，而選本因編選者的眼界、胸襟不同，水準參差，或因文學觀、派系的各異，各有面貌，也是人所共知的道理。香港文學未有較全面的選本，令到想了解香港文學的讀者，特別是外地的研究者，有無門可入之苦。大陸出版界，爲了打開這因局，頗有得風氣之先的行動，搶先出版了《香港散文選》（一九八〇年十月，福建人民出版社）、《香港小說選》（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福建人民出版社）、《香港作家散文選》（一九八一年十月，花城出版社），大陸部分讀者和學者在初期毫無選擇和比較情況下

，很容易認定了這三本選本是香港嚴肅的文學代表作。由於編者選文標準有特殊性，例如《香港作家散文選》的選文標準就是：「作家以敏銳的觸覺、人道主義的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

，……從不同的感受角度，寫出了香港社會的真實。」^{②4}全書顯示了「抒寫香港社會中下層人民的複雜矛盾的感情」^{②5}的面貌，但香港人都明白那不是香港散文的全部面貌。這本來還不大成問題，可是竟然有人利用兩個選本，就寫出了《香港散文主潮漫評》，並得出「抒寫香港社會中下層人民的複雜矛盾感情，是香港散文的一大特色」的結論來。^{②6}這種情況，反映了選本的局限性，但看了兩個選本就談「主潮」，並猝然下定論，亦可反映某些人的研究態度。幸而近幾年國內出版的香港作家專集及選本都多起來，而編選者的態度也開放得多，有了比較宏觀的面貌，這是很好的現象。

至於香港本地，也先後出版過不少選本，但由於種種客觀因素，水準仍很參差，以致讀者無法通過選本看出一些「真相」來。

當我們看到蘇叔陽說：

「恕我坦率地說，讀這本書頗有嘔一雙酸果的感覺，整部書，都讓人覺得作家們彷彿靈魂上戴著沉重的枷鎖，目光被濃重的霧所遮斷，使他們只能感慨於眼前的生活，或悲歌，或牢騷，或於苦澀中尋求小小的安忍與歡欣，或寄情於不可捉摸的朦朧的未來，而不能把目光透射到這個小島外面去，更不用說看見廣闊的世界和更加廣闊的宇宙。於是在文風上就給人以晦澀、恍惚，甚至有那麼點兒矯情的味道。這難道是島市生活的局限？地理文化所使然？」^{②7}

我們就以他沒有讀到不受「島市生活的局限，地理文化使然」的好作品爲憾。但我們也以本

地沒有出現一套有識見、夠公正無私的香港文學大系爲憾。

(3) 研究香港文學應有的態度

(A) 了解香港社會本質，不宜用別個地域的文藝觀、社會意識來選取研究角度：每個社會均有其獨特的精神面貌。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也自有與別不同的文藝格局、情調，而這在在均與該社會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背景有密切關連。

香港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城市，中西文化揉集，形成了別的地區不易存在的文化模式。而文藝也在自由地、自生自滅地發展。沒有一貫的文藝政策影響下，作品的多樣化、意識型態的千奇百怪，構成香港文學的特殊性，這也正反映在不同取向的文學作品中。如果研究香港文學的人，單靠部分作品的表現，而不明白香港社會情況，只用自己的所處社會的生活經驗及政治觀，強加詮釋，那很容易犯上隔靴搔癢之弊，甚至產生誤解。因此，了解香港社會本質，有助客觀研究。

(B) 超越自身的迷障，建立公正無私的觀點：香港本地研究者當然明白香港的社會情態，本不易陷入誤解的迷障中。但由於香港地區太狹，人際關係極度緊張，加上意識型態複雜而多樣，很易形成小圈子風氣。研究者有時因接觸面不同，又或礙於情面，往往無法用一超然態度去面對研究對象，甚或因此變成另一種迷障。直到目前，香港文學研究者仍未能

利用本身比別個地區優勝的條件，把香港文學放在整體文化層次中加以了解深究及定位，相信都與這種迷障有關。香港本地研究者應以公正無私的態度邁開大步，走出迷障，香港文學研究才不會劃地自限。

(C) 整理第一手資料，輯佚鉤沉，校訂正誤，公開應用：

香港文學研究困難的地方，就在沒有人整理好第一手資料，好讓研究者直接利用。但由於香港一向不重視文獻資料的保存，故要掌握第一手資料也不容易。不過爲了認真全面研究，先下苦功去整理資料，實在急不容緩。這是一件艱鉅的工作，但却非不可爲。

爲了編寫《香港文學史》，及香港文學研究深化等提供方便，我們必須趕快把第一手資料整理出來，並加以校訂正誤，這間接也可解決許多不必要的傳訛與爭論。同時，亦負起了鉤沉輯佚的任務，這特別對個別作家的研究，極有幫助。

一位香港文學研究者潘亞嘸（明月）說

「台灣文學評論工作和出版工作做得很好，要甚麼有甚麼，十分方便，而香港幾乎要甚麼沒甚麼，在史料方面，除盧女士外，幾乎沒有。」

⑳

他這說法，說對了一半，就是外地研究者的確是「要甚麼沒甚麼」。但說「在史料方面，除盧女士外，幾乎沒有」，那就不全對。文中盧女士是指筆者，我手頭的確有許多經整理過的第一手資料，但這只不過是我用多年功夫，在圖書

館、舊書刊中逐條找出來，加以校訂、整理的成果。我沒有特殊技能，有的只是耐力和小心。我所用的書刊，是公開放在圖書館裏，凡持有圖書館入館證的人都可以看到。而且，我能看到的只限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所藏的有限書刊。據所知，內地各大圖書館同樣藏有這些書刊，甚至比香港兩家大學更完備，例如國內就有《循環日報》、《珠江日報》。假如國內研究者能在這方面用力，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必然比我豐富。不過，我也明白，目前的學術風氣及研究環境，對於苦鑽史料的人，十分不利，用十年時間去做蒐集及訂正資料，幾乎太浪費精力，到頭來還不及用一兩年時間寫幾篇論文，那麼見到有益效應。而就算不畏困難，努力有了成果，也不容易公之於世，因爲出版社不會樂意出版這類資料性質的東西。現在，我能做到的是，在寫論文時詳列所用資料出處，以備別人追查，同時極力爭取出版機會，例如願意無條件提供資料，讓出版社出版《茅盾香港文輯》。同時，凡作家向我索取他自己的資料，我願無條件複印寄出。

資料是天下公器，應該全面公開，才能讓更多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寫成公允的評價或理論。希望有遠見的學術機構或出版社能大力支持，把香港文學的文獻資料作系統整理出版，這足以加快研究的步伐。

(D) 短期內不宜編寫香港文學史：

這一點與上面一點極爲相關，由於香港文學這門研究仍十分稚嫩，既無充足的第一手資料，甚至連一個較完整的年表

或大事記都還沒有，就急於編寫《香港文學史》，是十分危險的事情。資料不足或採用第二手資料，或加推想出來的文學史，必然十分粗糙，及必有謬誤。而且，由於香港文藝發展情況相當複雜而瑣碎，短期內不容易作一客觀而全面的評估。爲避免浪費精力及造成不必要的偏差失誤，在第一手資料未能確切建立之前，我不贊成在最近的短期內匆忙寫出《香港文學史》。

六、結語

依本文所敘，可見在文獻不全、資料未足的情況下，研究香港文學，真是舉步艱難，因此，要解決許多問題，努力建設香港文學史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急切的工作。這種耗費人力、時間、物力的工程，理應由一個學術機構，或一個組織，在合理的物質、人力支持下去完成。可惜直到目前爲止，仍未見任何學術團體給予鼓勵。還有值得提及的是：資料處理方法，應由從前的一手作業一轉到電腦化。由先進的科技爲我們節省人力及時間，且求得精確而快速的效果。我深深相信：資料是天下公器，沒有任何人有權把它隱藏起來。只有資料全面呈現，中國文學史（包括香港文學史）才能還其本來面目，才獲得公平論斷。爲了後人得到他們應知的權利，我們必須苦幹下去。

【註釋】

一九八八年九月初稿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六定稿

- ①例如在《八方》文藝叢刊第一輯（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香港有沒有文學？（筆談會）》中，蔡炎培就說過：「三十年來，此間的文學刊物，前仆後繼，大有眾志成城之概。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重商主義下文學的先天悲劇色彩；我更不知道，這是不是它的特有文化模式。惟是一部適足以還給它原來應有面目的小說猶未讀過。」
- ②《夏潮》卷五期四，一九七八年十月。
- ③殷德厚《馮牧談新時期文學和香港文學》，《星島晚報·大會堂》，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版十一。
- ④《明報》，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版七。另在《香港文學研究》一文中，亦列舉類型及代表名單。原文見《香港文學初探》，華漢文化事業公司，一九八五年二月，頁二至三十四。
- ⑤資料見④。
- ⑥《新晚報·星海》，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七日，版十三。
- ⑦《星島晚報·大會堂》，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版五。
- ⑧《是光明，還是黯淡？——記「香港文學的出路」座談會》，《新晚報·星海》，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一日，版十二。
- ⑨潘少梅《座談會實錄》，《中大文社社訊》，一九八四年期二，頁八至十。
- ⑩徐速《香港文學的出路問題》，《明報》，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二日，版五。
- ⑪古蒼梧《歌者何以無歌——也談香港文學的出路》，《新晚報》，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一日，版十二。
- ⑫《香港時報》，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二日，版七。
- 周鳳嫻《五十年代香港文壇》一文（《學苑

- 》第九，十期合刊，一九八一年）說，「美元文化」一詞，首見於一九六二年《文藝季》第二期的《十年來的海外文藝》，是錯的。
- ⑬《文藝季》期二，一九六三年夏，頁六至十二。
- ⑭劉以鬯《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星島晚報·大會堂》，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版十六。
- ⑮《新火》期四，一九八二年二月，頁六至九。
- ⑯《文學·作家·社會》，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波文書局。
- 關於「本土化始於六十年代中後期」之說，筆者也曾持此種論點，最近才有修正的想法。
- ⑰有關此冊錯處，筆者已另文一一指出，因篇幅關係，此處不詳舉例證。
- ⑱該文首刊於《當代文壇報》，後收入該作者的《香島散記》，一九八五年十月，海峽文藝出版社，頁一五〇至一五九。
- 有關此文錯處，筆者也另文一一指出，此處不再詳舉例證。
- ⑲《香港文學報》創刊號，一九八八年四月，版一。
- 該報第二期有了更正，但仍有錯誤。
- ⑳盧璋鑾《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原為香港市政局圖書館主辦第五屆「中文文學週」的講稿，後修訂刊於《星島晚報·大會堂》，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版二十。該文同時收入《香港文縱》一書中。
- ㉑林真《趕快動手——談香港文學史料的缺失》，《新晚報·星海》，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版十二。
- ㉒楊國雄《關於香港文學史料》，《新晚報·

星海》，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九日，版十二。

㉓楊國雄《清末至七七事變的香港文藝期刊》，《香港文學》期十三至十六，一九八六年一至四月。

黃康顯（黃傲雲）《從文學期刊看戰前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期十三，一九八六年一月，頁二十四至四十。

黃康顯（黃傲雲）《戰後初期香港的文藝期刊與文藝路線》，《讀者良友》卷四期三，一九八六年三月，頁八十至八十五。

㉔曾敏之《香港作家散文選·前言》，一九八一年十月，花城出版社。

㉕同②④。

㉖李以健《香港散文主潮漫評》，《當代文藝思潮》（蘭州），一九八四年期五，頁六十三至六十八。

㉗蘇叔陽《沙漠中的開拓者——讀〈香港小說選〉》，《讀書》，一九八一年期十，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頁三十至三十三。

㉘明月《是現象，並非「傾向」》，《星島晚報·大會堂》，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版十六。

【後記】

本文原應香港市政局之邀為「第十屆中文文學週」發言而寫，原題是〈十年辛苦不尋常〉，由於限於字數，無法詳述。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六日筆者出席北京社會科學院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合辦的「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又把本文加以修訂，再加「近十年香港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合成一文，作會上發言。現又把該文刪去後半部分，只取有關香港文學部分，並加修增，以補〈十年辛苦不尋常〉一文的不足。